

● 热点

欧洲“反犹主义”遭遇误读

[美] 亚斯查·蒙克/文 孙西辉/编译



近年来,欧洲右翼势力抬头,极端主义迅速发展,反犹主义也随之升温。随着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升级,今年5月至9月欧洲各国接连发生多起反犹事件。9月16日,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了大规模集会,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集会上发表了反对反犹主义的演讲,呼吁德国各界摒弃反犹思想,保护犹太人的合法权益。一时间,欧洲反犹主义与反反犹主义竞相角力。近期,《外交》杂志网站刊登了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亚斯查·蒙克(Yascha Mounk)的文章,分析欧洲反犹主义的现象和本质。

连那些自认为对移民政策持开放态度的人,也倾向于要求外来移民放弃前世的认同并彻底融入当地文化。长期以来,右翼民粹主义极力利用这些正面攻击自由和多元社会的思想,他们反对移民的立场不过是过时的“种族净化论”的翻版,最终将导向法西斯主义的老路。这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吸引力一直十分有限。多数欧洲人认为自己是世俗、现代和宽容的。尽管他们反对将自己的国家当作接纳外来移民及其文化和宗教的场所,但这些国家依然十分开放且具有多元性特征。

● 犹太人成为道德瑕疵的提示者

包括荷兰的基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和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内的新一代极右翼领导人深刻地吸取了这种教训,不再鼓动对穆斯林移民的仇恨情绪。但是,他们为这种仇恨披上了新的外衣。他们并非呼吁人们攻击现代自由社会,而是认为穆斯林移民危及社会秩序,理由是他们反对自由言论,坚持伊斯兰教法或对犹太人、妇女和同性恋不够宽容。欧洲的右翼极端主义已经变成一种所谓的“自由主义伊斯兰恐惧症者”(liberal Islamophobia)。

为了与其前辈区分,“自由主义伊斯兰恐惧症者”也接受犹太人。这一策略具有清晰的逻辑。由于过去受到迫害,犹太人成为欧洲的道德仲裁者,即主流社会宽容性的试金石。为了避免被指为种族主义,欧洲的民粹主义者学会了以某种宽容或启发性观点作为煽动性言论的前奏,如慷慨地赞扬犹太人和犹太-基督文明(Judeo-Christian civilization)。出于同样原因,勒庞和其他民粹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将穆斯林参与的反犹主义暴力事件置于聚光灯之下。这样做可以使他们在播撒仇恨种子的同时,披上宽容的外衣。民

粹主义者不断讨好犹太人的做法成效显著。凭借宣称支持宽容或开放社会等“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法国“国民阵线”等政党成功地由边缘转为主流。但是,他们的亲犹太主义并非真诚。

在许多欧洲国家,犹太人长期代表评判一国道德立场瑕疵的提示者。在德国,这种情况最为突出,因为犹太人被视作那段最黑暗历史的鲜活化身。年轻一代德国人对本国历史罪行的这种无处不在的纪念性证据感到越来越厌烦,因而决定使之更少地出现在公共场合。但是,也有些国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看待其历史,波兰、瑞典和法国过去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使其对二战时期英雄主义的叙述更加复杂。

考虑到犹太人在欧洲的社会道德剧中扮演的奇怪角色,民族主义者可以特别安心地称犹太人本质上与法西斯主义者或通敌卖国者没什么两样。通过表明犹太人也会实施暴力,他们希望减轻本国沉重的历史负担。当以色列今年夏天轰炸加沙时,欧洲民族主义者抓住机遇大肆宣传。

● 在反犹太人和反穆斯林中摇摆

民粹主义者联盟的曲调再次发生变化。过去十年,这些团体的主要倾向是与犹太人结盟。但近几个月,犹太人被一脚踢开,穆斯林取而代之。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者和穆斯林移民为伊斯兰政府的行为谴责甚至暴力惩罚欧洲犹太人。这种趋势长期以来都是欧洲左翼的特点,现在又转向了欧洲右翼势力。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在西班牙《世界报》上写道,加沙发生的事情表明欧洲犹太人为何“经常被驱逐”。当然,这种组合很可能也是暂时的。随着加沙冲突逐渐在记忆中消退,有关欧洲犹太-基督同根的说法很可能会重新回来。由于挑逗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关系极具诱

惑力,且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移民的确比欧洲剩余的犹太人对欧洲认同的威胁更大,“自由主义伊斯兰恐惧症者”将很快重拾他们那种不真诚的亲犹太主义。

能够终止这种无休止的破坏性钟摆的唯一办法是说服欧洲人扩大对民族认同的理解。他们需要接受一个奥地利的致敬,无论他来自因斯布鲁克还是伊斯坦布尔;还要接受能够丰富本地文化的外来习俗,包括寿司、瑜伽、清真食品和光塔。欧洲人能否以这种方式改变他们的自我认知仍未可知,但这对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犹太人和穆斯林也绝非欧洲民众手中的玩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代理机构重塑这种未来。为此,他们需要牢记彼此的利益高度重叠:一个民族主义化的欧洲追求同质化的民族概念,将对这两类族群极不友好。

令人吃惊的是,穆斯林和犹太人合作得非常成功。犹太人联合会经常保护穆斯林免受右翼政客的种族主义攻击。包括勒庞的“国民阵线”在内的一些政党,拒不承认反犹主义,也拒绝与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合作。同样,多数欧洲的穆斯林联合会明确谴责针对犹太人的攻击。但也有迹象表明,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可能乐于加入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游行中。穆斯林移民中的反犹主义情绪真实存在且不断上升,参与暴力袭击犹太人的穆斯林人数也在增加。同时,少数知名犹太知识分子,如法国的阿兰·芬基尔克劳德(Alain Finkielkraut)和德国的亨利克·布罗德(Henryk Broder),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伊斯兰恐惧症者”立场。

然而,具有最终选择权的是欧洲大众。面对这些具有吸引力的“自由主义伊斯兰恐惧症者”言论,构建一个开放社会不可能以排他主义为基础。假如普通欧洲人及其政治代表屈服于赞美犹太人而诋毁穆斯林的诱惑,或赞美穆斯林而排斥犹太人,他们将获得一个不够宽容和多元的社会,这是远非他们所期待的。

● 国外高校传真

枪支越多并非越安全

斯坦福大学

11月14日,斯坦福大学著名法学教授约翰·多诺霍(John Donohoe)接受专访,再次明确“允许携带枪支的法律规定,与暴力犯罪攀升有直接关联”,从而驳斥了最近的一项实证研究,它声称“枪越多反而更安全”。过去二十年间,有关允许隐蔽携带枪支的法案引发了激烈辩论。尽管尚无联邦许可令,但是美国的50个州都通过了法案,允许市民在公共场所隐蔽携带枪支,不过有些州要求必须获得当地政府或执法部门的许可,有些州则没有此要求。多诺霍教授指出,先前的研究以1992年之前的数据为基础,得出结论是相关法案降低了犯罪率,但是如果利用最新数据,比如1999年至2010年间的数据库,那么结论非常明显:该法律与暴力犯罪,诸如强奸、抢劫、谋杀、人身攻击等有着显著关联,至少提高了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他也承认,“不同的统计模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目前学界对于什么才是最好模型尚无定论。很多学者在研究该法律的效应时,仍纠结于方法论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最新的权威数据还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福利辩论陷入误区

伦敦政经学院

11月12日,伦敦政经学院社会排挤研究中心主任、社会政策学教授约翰·希尔斯(John Hills)举行公开讲座,介绍了他最新力作《好日子、坏日子:有关“他者”与“我们”的福利神话》,对福利国家存在的流行说法进行了驳斥。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福利国家做的事情就是“给少数失业、无用的‘寄生虫’发放施舍,他们也安于依赖长期福利生活,无所事事”。希尔斯指出,“实际上,人们的生活,从出生到死亡,一直随着收入波动而发生变化。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阶段享受到了福利待遇,总体来说,得到的和付出的基本持平。研究清晰显示,在福利享受上,并没有什么‘我们’与‘他者’的区别,只有‘我们’。”他评论说,“目前有关福利的政治、政策辩论,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之上的,好像存在一群不变的‘他者’,由一群不变的‘我们’来交税,提供施舍。事实却是,人们不断陷入贫困、摆脱贫困,工作者的收入水平不断变化,甚至每周、每月都有很大不同。福利国家的绝大多数支出是在国民医疗、教育、养老领域,每个人都是获益者,只不过时期不同罢了。”

记者不应低估职业风险

哥伦比亚大学

11月16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朱蒂丝·马特洛夫(Judith Matloff)教授等人开始了为期三天的专题工作坊,题为“在冲突地域,如何安全报道新闻”。她首先指出:今年以来,全世界已经有逾40名记者惨遭杀害,超过200名遭到监禁。比如:著名自由新闻撰稿人詹姆斯·福莱(James Foley)、斯蒂文·索特洛夫(Steven Sotloff)等,就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共和国民兵斩首。她分析道,“有些记者低估了他们将面临的风险;有些是在社交媒体上暴露了自己的所在;还有些是重返险地,明知可能被射杀仍冒险前往。记者们应当不要欺骗自己,问问自己:‘这份报道值得冒这么大风险吗?’出发前,应当做好预案,要想想可能会发生最坏的事情。准备、准备、再准备,准备越充分,风险也越低。”该工作坊是其新闻专业继续教育项目之一,旨在向记者、制片人、摄影记者等展示如何在高危环境下谨慎工作。他们将学习如何评估风险、防止被强奸或其他身体攻击、如何应对创伤。它还包括:计算机专家教授如何保存敏感数据与通讯;前国民警卫队军医教授急救知识,如快速止血、如何将受伤同事拖出危险境地等。

历史学事实上并未死去

新加坡国立大学

11月13日,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及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宣布,设立专门的“新加坡历史研究奖”,将对该领域杰出著作进行表彰。该奖是为了纪念新加坡独立50周年,由该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肖·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教授倡议发起,“旨在大力鼓舞针对新加坡历史的相关研究,激发最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著作出版,对促进世界有关新加坡历史的理解产生持续的重大影响,鼓励相关批判性反思。”马布巴尼教授指出,“与一般看法不同,历史学实际上并未死去。它总是随着重大历史事件不断浮出水面,既影响国际事务,如中日关系,也对国内思潮产生显著影响。明年,新加坡将迎来和平、繁荣的50周年,但是有关新加坡的历史却仍然争议不断。该奖就是为了催生相关创新研究,帮助后代理解新加坡历史真正的唯一性、特别性。”该奖将每三年授予一次,获奖作者将获得5万新元,从而成为迄今该领域奖金最高的奖项。它面向全球,接受任何作者、任何出版社、对任何有关新加坡历史研究的英文作品的提名,可以是著作,也可以是翻译。(本栏目由方卫编译)

● 专家观点

努里埃尔·鲁比尼:一台引擎能否驱动全球经济

在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被视为全球经济的两大驱动器。然而,欧洲、日本和一些新兴大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10月31日,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评论汇编》杂志网站发表文章,分析当前全球经济的动力问题。

全球经济就像一架喷气式飞机,需要发动所有引擎才能直冲云霄。然而,它的四大引擎中只有一台在正常运转,即美英经济。作为第二大引擎的欧元区,在后危机时代重启乏力,目前已经失速。日本与之类似,这个全球经济第三大引擎在经历了一年的财政和金融刺激之后已耗尽燃料。第四大引擎是新兴市场国家,它们在过去十年因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美联储的零利率即量化宽松政策而顺风顺水,现在却出现明显减速的迹

象。

当前的问题是,一台引擎能否驱动全球经济以及能够维持多久。其他地方的经济低迷意味着需要更加坚挺的美元,但这必将损害美国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的经济越减速,美元就会越升值,美国就越难减缓其他地方的经济压力,即使美国国内需求再旺盛也无济于事。石油价格下降为企业和家庭提供了更便宜的能源,但这不利于能源出口国的生产和消费。北美页岩资源的提高进一步增加了石油价格的下行压力,因而减弱了欧元区、日本、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需求。此外,在共和党完全控制国会的情况下,政策僵局很可能更加严重,进而妨碍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结构性改革。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也陷入麻烦之中。“金砖五国”中有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和南非)濒临衰退,中国正处于结构性减速过

程中。

然而,全球经济坠毁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多数发达国家正快速实行“去杠杆化”(deleveraging),财政拖累的影响较小,货币政策依然可行,资产通贷再膨胀(asset reflation)具有积极的财富效应。此外,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仍然保持快速增长和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并着手进行促进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美国目前的增长超乎预期,至少能为全球发展提供足够的拉动动力。但是,严峻的挑战还在后面。发达国家公私部门的债务依然很高且仍在上涨,这种趋势无法持久。富人和公司法人这类具有高储蓄倾向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日益严重,并会随着资本密集型与需要更少劳动力的技术创新而进一步恶化。高债务与不平等加剧增加了结构性改革的政治难度。

此外,欧洲、北美和亚洲的民族主义、民

粹主义和本土主义政党极力阻止自由贸易和劳动力流动,这将进一步影响全球经济。另一方面,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使富者更富,成为资产通贷再膨胀的主要受益者。幸运的是,尽管中东动荡、俄乌冲突和地区争夺等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埃博拉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地缘经济威胁妨碍了资本支出与消费,但它们并未合流为财经传染病(financial contagion)。总之,全球经济正以一台引擎驱动,飞行员必须面对险恶的暴风雨和乘客之间的争斗,但愿地面上有急救人员。

(吕虹/编译)



罗伯特·雷克托:福利政策造就美国单亲家庭

美国主流社会重视家庭的价值,但美国当代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家庭问题丛生。2014年11月18日,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雷克托(Robert Rector)在《每日信号报》(Daily Signal)发文,分析了美国社会的单亲家庭,指出美国社会的福利救济政策促进了单亲家庭的增长,加剧了婚姻家庭危机。

为解决贫困问题,美国政府向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提供了许多福利资助,其中包括劳动所得税抵免,贫困家庭临时救助,妇女、婴幼儿食品项目,食品券、公共住房和医疗补助等。虽然生育孩子的已婚夫妇也可以从这些社会福利救济项目中获得帮助,但是大多数救助家庭抚养孩

子的福利项目在实际执行中都偏向于单亲家庭。

由此产生的影响多少出乎意料,国家福利救济政策至少在两个方面促进了单亲家庭的增长。首先,福利救济项目降低了婚姻的经济功能。在传统社会中,如果没有配偶的支持,拥有不到高中学历的单身母亲很难独自抚养孩子。但是,自从从贫困宣战开始以来,社会福利救济项目为抚养孩子提供各方面的援助,大幅减少了单亲家庭的困难。随着低保补助扩大,福利救济开始在家里作为丈夫收入的替代,低收入家庭开始消失。丈夫离开家庭,单身母亲能够获得更多福利补偿。可以说,福利救济使得婚姻的经济功能降低了,导致结婚率下降。

其次,福利救济制度惩罚了低收入者的已

婚夫妇。所有福利救济项目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如果一个家庭收入上升,享受的福利救济就应当减少。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低收入单身母亲嫁给了挣新水的父亲,她享受的社会福利通常会大幅减少。例如,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每年收入15000美元,通常每年会享受到大约5200美元的食品券。但是,如果她嫁给相同收入的单身父亲,她就不能享受食品券的福利待遇了。这就从经济上惩罚了婚姻。

目前,联邦政府有80多项社会救济福利项目,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个人提供现金、食物、住房、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每个项目都包含上述类似的对婚姻的处罚内容。低收入家庭一般可以同时从几个福利救济项目中获得救助。为避免丧失福利

救助条件,大多数低收入的人出于经济考虑而拒绝结婚。很明显,在当代福利救济制度下,对双方都有工作的已婚夫妇来讲,这种福利制度是最不公平也是最有伤害的。

改革是必要的。然而,美国有多种不同的救济援助项目,福利救济制度复杂。完全消除反婚姻的福利救济制度代价昂贵,不可能一蹴而就。政策制定者可以逐步减少反婚姻的福利救济项目,改革劳动所得税抵免以减少对婚姻的伤害。

(吴学丽/编译)

